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及其模式识别： 基于皖南 47 村的比较分析

陈立豪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深化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为系统阐释空间演进的内在逻辑,构建“文化时间—文化实践—文化表征”三维理论框架。其中,文化时间为空间生产提供历史延续的根基,文化实践通过主体协作推动空间功能转化,文化表征则在符号层面构建空间的认同与价值。通过对皖南地区 47 个村落的实地调查与比较分析,识别出积累型、分化型、调和型与共治型 4 种空间生产模式。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健康发展依赖于文化时间、文化实践与文化表征三者的协调互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应在文化传承与现代创新之间寻求平衡,进一步强化乡村社区参与,推动地方治理多元化与共治机制的深化发展。

关键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文化时间;文化实践;文化表征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6)03-0070-11

Product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47 villages in southern Anhui

CHEN Liha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s serve as critical carriers for advanc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o systematically unpack the internal logic underlying spatial evolu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time-cultural practice-cultural representation”. Specifically, cultural time provides a historically continuous foundation for spatial production; cultural practice dri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atial functions through multi-agent collaboration;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constructs spatial identity and value at the symbolic level. Based on field surveys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47 villages in southern Anhui, four spatial production modes are identified: the accumulative mode, differentiated mode, harmonized mode, and co-governance mod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s relies on the coordinated interaction among cultural time, cultural practice,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o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space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modern innovation, further enhance rur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and the deepening of co-governance mechanisms.

Key words: rural areas; public cultural space; time; practice; representation

在 21 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夯实乡村这一“基本盘”尤为重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作为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承载集体记忆,承担着传承传统文

作者简介:陈立豪(1997—),男,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弘毅博士后,武汉大学场景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政策与文化空间。

化、强化集体规则、促进文化参与与认同凝聚的功能,其形成于特定地域与文化认同之上,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多层次文化样态。“十五五”规划将文化建设提升至关键战略位置,明确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要求提升公共文化空间可达性、品质与在地性,同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乡村文化,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方向。

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处于传统与现代交织、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关键期。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冲击乡村社会结构,祠堂、庙会等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凝聚作用弱化;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书屋、文化礼堂等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不断涌现,但建设中仍存在设施同质化、文化认同弱化、资源开发与原真性保护冲突等问题,背后反映出内生动力不足、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健全等深层次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皖南地区具有文化多样性与地域典型性的村落,从生产机制与模式识别切入,探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进路,为新时期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一、研究述评

空间与文化的关系是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重点。随着社会学科“空间转向”研究的成熟,学者们将其拓展至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的互动研究,理论上形成“文化空间”“文化场景”等概念,实践上提出原真性保护、空间功能更新等对策。本部分将梳理空间生产理论发展脉络、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及其生产相关文献,明确本文研究的定位与创新点。

(一)空间生产理论的演进与中国本土化

空间生产理论研究早期生发于古典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在社会学领域,涂尔干率先将空间视为独立的分析范畴,强调时空具有根本的社会属性;齐美尔则通过“社会几何学”揭示空间的社会关系维度,指出空间具有独占性、分割性、固定性等属性,为探讨空间与社会互动开辟了新路

径^[1]。同时,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等强调文化对于空间意义建构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文化通过符号体系赋予场所以独特的内涵^[2],使特定空间成为承载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场域,为“文化空间”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资本社会持续发展,发展不平衡引发的空间矛盾不断凸显,相关研究逐步拓展至现代批判理论领域。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提出“空间三元辩证法”,这一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空间生产理论正式形成。他所划分的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各自承载物质空间的生产、观念空间的规划构想与日常生活空间的主观体验,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共同塑造着社会空间。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空间与社会的关联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地理学家苏贾提出“第三空间”概念,将现实空间、想象空间与生活经验融为一体,以此突破物质与意识空间的二元对立^[3];社会学家 Castells^[4]探讨城市空间中的“集体消费”现象,阐明现代城市职能已从生产中心转变为国家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场所。福柯以“异托邦”理论阐释权力与空间的关联,剖析权力依托空间布局实现对身体与日常生活的规训^[5]。布迪厄等^[6]立足实践逻辑提出“场域”与“惯习”理论,阐释社会空间中的权力秩序借助象征资本和日常实践完成再生产的过程。奥斯本^[7]着重关注空间生产的时间维度,提出“现代性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文化”的论断。上述诸多研究丰富并拓展了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该理论已然成为剖析空间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工具。

空间生产理论引入中国后,经历了从理论译介到分析本土问题的过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这一理论被广泛用来分析我国城市更新、城乡关系、乡村社会转型等议题。学者们尝试结合西方空间理论与本土政治经济情况,探讨制度环境、资本逻辑和地方实践如何一起塑造中国城乡空间形态,以及这些形态承载的文化意义。李春敏^[8]提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三维框架,涵盖全球扩张、

城市空间重组与生活空间异化,并阐明这一框架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启示。刘怀玉^[9]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解读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观点,进而揭示现代性语境下空间生产所面临的矛盾。

(二)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进展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最初围绕其基础功能展开,关注这类空间在承载乡村公共生活、延续乡土文化脉络中扮演的角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被看作历史记忆、地方景观与主体实践共同作用形成的整体。祠堂、节庆、礼俗以及日常交往活动依托具体场所存在,这些文化形态与生活实践相互交织,在持续运行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构成空间内涵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内在动力^[10]。

现代性的持续冲击、乡村人口的结构性流动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向基层不断延伸,促使研究重心转向空间自身的动态变化过程。乡村日常生活与传统空间的联结逐渐松散,空间原有的象征意义不断弱化,文化自我更新与再生产能力不足,成为多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面临的现实处境^[11-12]。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也因此被纳入治理研究的视野,制度层面的资源输入、地方层面的实践适应与乡民自身的文化意识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空间的存续状况与发展走向。物质载体的修缮维护、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以及公共行为规范的重新若能形成有效配合,将为传统空间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提供重要支撑^[13-15]。旅游开发与文化消费持续向乡村渗透,文化记忆传承、地方叙事建构、乡土真实性维系与乡民身份认同重构共同参与到空间转型进程之中。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多重力量作用下呈现出多元面向,既承担着文化传承的核心功能,也具备景观展示的外在价值,同时成为基层开展协商治理的重要载体^[16-18]。

(三) 乡村文化空间生产的研究路径

“文化空间”已成为乡村文化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学者们的关注重心逐步聚焦于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部分学者将文化视为可利用的

工具,重点凸显其在空间治理中的实际作用。这种“文化工具论”认为,文化振兴可作为国家软治理的有效手段,通过文化传播及相关活动,推动村民认同主流价值与集体规则,进而引导规范乡村空间实践^[19]。在此背景下,文化充当着空间整合与社会动员的媒介,核心作用在于凝聚共识、消弭分歧,让公共文化空间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目标。另有一类研究强调文化本身即是生产活动的对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核心,是乡村社会价值观、生活方式、集体记忆等文化内容的传承、转化与创新^[20]。这一核心诉求既体现在传统民俗、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也通过移风易俗、文明创建等实践,塑造空间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导向^[21]。

综合主义进路研究学者则认为,文化在空间生产中兼具“对象”与“工具”双重属性。从“对象”维度,空间生产包含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及传统资源等文化内容的再生产;从“工具”维度,文化所承载的价值观念、情感认同与行为规范,是驱动村民参与、凝聚社区共识、激活空间内生动力的关键机制^[22]。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已成为政府、村社组织、村民及市场等多元主体博弈、协商与合作的关键场域。国家意志通过政策与符号嵌入空间,村民通过日常使用与实践进行地方化解读和再创造,市场力量则重塑资本逻辑与消费文化^[23-24]。治理格局已从传统权威主导转向多元共治,各主体间的权力关系、资源分配与协商效率,影响着空间运行效能,最终塑造出差异化的空间生产模式。

(四) 研究述评

既有研究为理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整体仍存在 3 个方面不足,相关讨论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一是历时性分析相对薄弱。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特定时间节点的空间形态与特征,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从传统到现代的长期演变过程缺乏连贯系统的梳理,对历史脉络与政策周期相互作

用下的动态运行机制,也未能展开更为充分的阐释。二是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多数研究或偏向宏观层面的政策分析,或侧重微观层面的个案考察,将宏观背景与微观实践相结合的整合性视角较为缺乏,难以系统完整地把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多元驱动下的形成与发展逻辑。三是实践导向有待强化。现有成果多以理论阐释与现象描述为主,针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具体实施路径、可操作对策等方面探讨不足,对基层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回应能力仍有提升空间。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尝试构建整合时间、实践与表征的三维分析框架,并以皖南地区47个村落为对象开展比较研究,以此识别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模式的差异特征,进一步揭示其背后的结构性规律。

二、“时间—实践—表征”三维分析框架构建

本文将“文化时间—文化实践—文化表征”三维机制作为理论主线,构建一个贯通历史传承、主体行动与意义建构的分析框架。该框架融合空间生产理论、文化场景理论与文化生态观等学术视角,从时间性、实践性与符号性3个维度整体把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成与演化逻辑。

(一)三维机制的内涵与逻辑

文化时间维度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历史脉络中的延续与演变,强调时间因素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该维度立足于文化生态视角,着眼于传统与现代在乡村空间中的持续互动。宗族伦理、节庆周期等长期实践塑造了公共文化空间相对稳定的早期形态,也构成其延续的时间基础。现代社会节奏的进入则推动空间形态与功能逐步调整。传统资源并未停留于既有形式,而是在代际传承中不断被重新理解和运用,空间因此在延续中发生变化。文化时间维度补充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的历时性视角,有助于解释不同地方空间演进路径的差异。

文化实践维度关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中的主体互动与社会过程,聚焦实践逻辑在空间生

成中的作用。该维度的提出立足于空间生产理论对权力、资本和社会关系的剖析,强调不同主体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分工与协作关系^[25]。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实践场域,其生产过程涉及基层政府、村民群体、市场力量与社会组织等多类行动者。多元主体的持续互动可能形成合力激发空间活力,也可能因冲突阻碍空间发展。外部制度支持与内生动力的平衡尤为关键,政府政策与资金投入可提供发展契机,但若忽视本地主体的积极性,容易导致公共文化空间使用率降低。相反,仅依靠村民自发力量而缺乏制度保障,空间运行亦难以持续。关键机制在于不同主体实践逻辑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文化表征维度聚焦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符号意义与认同建构,凸显表征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其概念基础源于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对地方符号与意义体系的研究,以及文化场景理论对场所氛围要素的分析。作为空间生产输出的意义系统,文化表征的核心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所承载的符号系统及其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在乡村语境中,公共文化空间通过物质与非物质符号传递特定文化价值:一是象征符号体系,由承载抽象价值观的物质载体与仪式活动组成,构成可感知的空间语言;二是价值规范导向,通过道德伦理、乡贤文化与集体记忆传递共同价值规范空间使用的伦理边界;三是身份认同建构,依托村落内外社会网络,在持续协商中形成对空间的共同体归属感。文化符号承载着乡村历史价值,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保护性利用与创新演绎,可将其转化为空间的情感与价值内涵,在社区中凝聚价值共识、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认同。

(二)三维机制的内在关联与协同作用

“文化时间—文化实践—文化表征”三维机制存在紧密内在关联,在空间生产中协同发力。文化时间维度为空间生产提供历史脉络与延续力量,但仅靠历史传统难以形成富有活力的公共空间,还需文化实践的推动与文化表征的意义赋予。

过度固守传统会导致空间无法适配现代生活,片面追求功能改造则会中断文化传承、引发村民抵触。二者需有机衔接,将传统文化基因融入当代实践,在延续文化根脉的同时注入新活力。

文化实践与文化表征相辅相成,共同决定公共文化空间的认同感与村民参与度。文化实践明确空间的治理模式与使用状态,而缺少文化表征的价值引领,即便治理形式完备,也难以激发村民的情感认同。部分乡村新建文化广场虽功能齐全,但因未融入地方特色文化符号与活动,使用率偏低,这正是实践供给与表征认同脱节的体现。因此,空间生产中需通过文化表征为实践注入意义,将社区共同价值观与身份认同融入空间治理,在公共活动中凸显乡村传统美德与地方历史叙事。同时,借助本土特色景观、传统节庆等符号营造,激活空间文化意义网络,推动村民自觉参与空间使用与维护。实践提供动力机制,表征凝聚认同机制,二者缺一不可^[26]。

文化时间与文化表征的互动,为空间生产注入深层文化内涵。时间维度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需通过表征维度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符号,才能作用于当下空间实践;而表征维度创造的新文化符号,若能获得历史脉络支撑,其社区认同度与持久性会显著提升。文化时间为符号提供来源与依据,文化表征为传统赋予当代意义,二者共同维系空间精神血脉的延续与更新。

(三) 三维机制比较及类型划分基础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文化时间、文化实践、文化表征三维机制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中的异同,表 1 展示了三者机制构成要素、关键作用机制和空间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主要特征。该比较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类型划分依据,即通过考察不同村落在三维机制上的侧重与差异,可以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模式划分为若干类型,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分析各类型的特征与问题。可以看出,文化时间维度强调历时传承与适应演化,突出空间发展中的时间积累效应;文化实践维度强

调主体互动与秩序重构,突出多元行动对空间结构的塑造;文化表征维度强调符号赋义与认同建构,突出文化意义对空间价值的塑造。这些差异使得不同乡村在公共文化空间生产上可能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类型。

表 1 文化时间、文化实践、文化表征三维机制比较

比较维度	文化时间	文化实践	文化表征
构成要素	历史积累、代际变化、现代冲击	多方参与、资源流动、制度安排	符号载体、价值观念、文化认同
作用机制	传统与现代融合,推动空间发展	多方互动重构空间,内外动力结合	符号赋予意义,共识凝聚认同
空间表现	传统与现代空间并存,体现时间层次	功能配置反映治理模式:政府主导或社区共建	空间景观传递文化意义,本土符号增强认同,外来符号可能削弱认同

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模式识别与实证分析

本部分构建“舒适物表征—文化价值阐释—场景分析”的研究路径,通过皖南地区 47 个村落的田野调查,结合量化数据与模式识别方法,系统解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模式的差异化表现。实证分析聚焦文化场景的公共性、认同性、日常性三维度,以及生产机制的时间、实践、表征三要素,通过数据采集、标准化处理、统计检验与模式划分,揭示空间生产的异质性机理。

(一) 研究设计

本文立足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核心逻辑,将乡村舒适物作为生产机制的具体载体,分析其通过空间实践转化为文化场景价值符号的路径。乡村舒适物系统包含 48 类物质与非物质要素,依托其自身属性,串联起生产机制各环节的关联。乡村文化场景作为空间生产的核心分析视角,整合物理设施、行为实践与文化符号的互动,形成多元协同的分析体系。场景维度分析将生产机制的过程要素与场景的结果表征相结合,通过理论推导,构建起贴合乡村实际的分析模型,用以阐释生产机制与场景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

1. 乡村舒适物:生产机制的具象表征

乡村舒适物的公共性维度体现为空间作为权

力流动与治理实践的场域,认同性维度体现为符号系统通过代际实践维系文化生态平衡,日常性维度体现为自然节律与主体行为的时空耦合。文化场景理论将空间从静态背景转化为能动实体,通过物理设施、行为实践与文化符号的协同作用生成价值。场景的客观结构由设施、行为与符号构成,主观认知围绕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展开。生产机制与场景维度的关联模型强调时间维度奠定场景基底,实践维度塑造场景形态,表征维度重构场景意义。

表2 乡村舒适物构成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承载舒适物 (物质要素,28类)	承载舒适物 (非物质要素,20类)
公共性	易聚集的区位节点	村口大树、凉亭、文化广场	下棋、广场舞
	公众性的活动参与	村委公示栏、文化站、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厕所、停车场)	村晚、集体选举
	可互动的空间功能	活动中心、老年活动室	电影放映、打牌
认同性	可想象的集体记忆	古井、磨坊、古树	地方信仰、传说
	可意象的空间节点	山川、传统民居、牌坊	河边洗衣、劳动号子
	可感知的美好事物	风景名胜、绿色植被、庭院装扮	踏春、赏花习惯
日常性	规律性的活动演替	集市、农田	双抢、晒秋
	仪式性的行为途径	宗祠、祖坟	祭祀、庙会、婚丧嫁娶
	现代性的生活方式	快递服务站点、农家乐、民宿、酒店、书店、文创市集	微信群、音乐节、观看短视频

2. 乡村文化场景:舒适物的价值阐释

乡村文化场景是理解空间生产机制的核心视角,它既包含物理空间内的设施与环境,也承载着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与主体行为的互动意义。场景理论将空间理解为动态的行为与意义载体,而非静止的背景,这一理论为乡村情境分析提供了契合的框架。乡村社会中,祠堂祭拜、田间耕作、集市交易等日常活动,构成了村民的生活场景,个体在这些场景中承担不同角色,生动展现乡村文化风貌。

乡村场景的结构包含物理设施、行为实践、文化符号3个要素。物理设施是文化活动的载体,其功能会随社会需求动态转型,行为实践将设施转化为意义生成的场域,文化符号则连接着历史记

忆与现实认同。三者协同作用,共同构建起乡村场景的价值生成机制。场景理论的综合视角,将空间生产解读为多要素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视角下,乡村舒适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实用与美学层面,更核心的是其推动文化再生产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多要素的协同作用。

表3 乡村舒适物内涵与理论关照

维度	内涵	理论关照
公共性	空间作为权力流动与治理实践的场域(如祠堂议事功能强化)	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物质载体
认同性	符号系统通过代际实践(祭祀、节庆)维系文化生态平衡	历史记忆与制度规范的内化机制
日常性	自然节律(农耕周期)与主体行为(民宿经营)的时空耦合	空间功能动态转换的实践脉络

3. 场景维度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分析

为阐明生产机制与场景维度的因果关系,本文立足生产机制的过程性要素与场景维度的结果性表征,结合两者核心构成要素,搭建分析框架并从宏观至微观推演相互作用路径。生产机制侧重过程性要素,场景维度侧重结果性表征,生产机制通过文化实践塑造场景特征,场景维度作为空间生产的具体载体,也会反作用于生产机制,影响其运行动力。本文从舒适物表征出发,形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机制的观测思路,以场景分析为桥梁将理论转化为可测量的变量体系。公共性、认同性、日常性对应空间场景的核心特征,时间、实践、表征对应生产机制的核心要素。基于这一观测思路,研究通过实地调查与数据收集,完成皖南地区村落的样本选取与量化测度。

表4 乡村文化场景维度

主维度	一级子维度	二级子维度	正向描述 (1-5分,5分示例)
乡村文化场景	公共性 A1	聚集性 B1	物理空间通达便利度高;邻里关系和谐、友好
		参与性 B2	休闲娱乐或公共活动丰富;鼓励主体积极参与
		功能性 B3	空间功能复合多样
	认同性 A2	记忆性 B4	风俗习惯保留;具有较高自我认同
		象征性 B5	村落布局具有本地特色;房屋装饰保留乡土气息
		审美性 B6	文化生态环境保护良好
	日常性 A3	规律性 B7	保留传统生活节奏;真实的乡村氛围
		仪式性 B8	丰富的传统节庆活动
		现代性 B9	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现代化变迁

(二) 研究样本与方法

本文选取皖南地区 47 个典型村落为样本,通过地理分布和文化特征综合筛选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与差异性(见表 5)。皖南作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保留了徽州“依山建村、引水营田”的传统聚落格局,其祠堂、古树、梯田等物质遗存与农耕节庆、祭祀仪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交织在一起,为研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演进机制提供了鲜活案例。该地区较早经历了传统空间功能的转型与冲突,揭示了传统存续与现代适应之间的张力。此外,47 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拥有较完备的档案资料和场地基础,有助于理论框架的实证检验。

表 5 样本村落名单

所属地级市	村名
黄山	塔川村、屏山村、关麓村、西递村、宏村、南屏村、卢村、历溪村、环砂村、渚口村、黄村、溪口村、万安古镇、阳产村、北岸村、昌溪村、渔梁村、许村、棠樾村、呈坎村、唐模村、潜口村、郭村、永丰村
宣城	水东古镇、胡乐司村、朱旺村、江村、章渡村、查济村、黄田村、上庄村、黟头村、湖村、龙川村、仁里村、耿村
芜湖	西河古镇
池州	高路亭村、严家古村、所村、元四章村、石门高村、陵阳古镇、花园里村、南溪古寨
铜陵	浮山村

为确保分析的科学性,本文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将乡村舒适物划分为 48 类,并设计标准化评分表,邀请 7 名熟悉公共文化空间研究的专家通过德尔菲法对每类舒适物在公共性、象征性、活跃性等维度上进行多轮打分。由于许多舒适物特征难以直接量化,专家评价可利用其经验进行判断,并通过匿名多轮反馈统一评分标准,减少主观偏差。同时,通过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获取村民视角的数据,如各类舒适物的使用频率、参与率和知晓率。针对物质要素,本文综合考虑其数量和质量进行评分,对于非物质要素依据活动频次或传播广度评分,最后通过标准化公式计算出各场景维度的得分。专家主观评价与村民调查数据相互验证,既保留了地方性经验,又提升了跨案例的可比性,为不同村落文化场景的比较奠定了可靠基础。

子维度得分 =

$$\frac{\sum_{i=1}^m \text{物质要素得分}_i + \sum_{j=1}^n \text{非物质要素得分}_j}{m + n}$$

其中: m 表示该子维度下物质要素(类别)数量; n 表示该子维度下非物质要素(类别)数量。

最终得出 47 个样本村落在 9 个子维度上的得分。表 6 为得分描述性分析(按维度)。

表 6 47 个样本村落乡村文化场景得分描述性分析

主维度	子维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公共性	聚集性	2.421	4.831	3.448	0.863	0.25
	参与性	2.422	4.761	3.609	0.731	0.202
	功能性	2.447	4.713	3.458	0.784	0.227
认同性	记忆性	1.84	4.826	3.51	0.858	0.244
	象征性	1.951	4.939	3.54	1.007	0.284
	审美性	1.965	4.798	3.42	0.938	0.274
日常性	规律性	1.977	4.911	3.623	0.875	0.242
	仪式性	1.975	4.938	3.651	1.028	0.282
	现代性	1.885	4.85	3.782	0.976	0.258

在定量分析方面,本文运用潜在剖面分析(LPA)来识别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典型生产模式。LPA 适用于连续变量的群组划分,可在未知潜在类别结构中发现子群。研究以 47 个村落的“公共性、认同性、日常性”得分作为输入,通过统计拟合指标(AIC、BIC、LMRT 等)确定最优分类^[27]。结果表明,四剖面模型拟合效果最佳,对应积累型、分化型、调和型、共治型 4 种空间生产模式。与预设阈值或主观分类不同,LPA 通过数据自身的分布特征发现群组,能够客观揭示村落间空间生产机制的异质性。在模型与数据基础上,本文随后对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形成逻辑和典型特征。

表 7 潜在剖面分析拟合结果

剖面数	AIC	BIC	ABIC	P 值		Entropy
				LMRT	BLRT	
1	369.645	380.746	361.928	—	—	—
2	178.628	197.129	165.766	0.003	0.000	0.997
3	29.329	70.032	1.032	0.121	0.000	0.989
4	63.483	96.785	40.330	0.000	0.000	0.998
5	29.329	70.032	1.032	0.120	0.000	0.994

(三) 生产模式识别与机制类型分析

基于前述模型与数据,本文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对 47 个村落的场景维度得分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四剖面模型为最优解,对应 4 种典型的空生产模式(见图 1)。为呼应理论框架,这

4种模式分别命名为积累型、分化型、调和型与共治型。各模式在公共性、认同性与日常性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反映出“时间—实践—表征”机制的

不同组合方式,呈现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从均衡发展局部失衡的连续谱系。以下依次阐释4种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生成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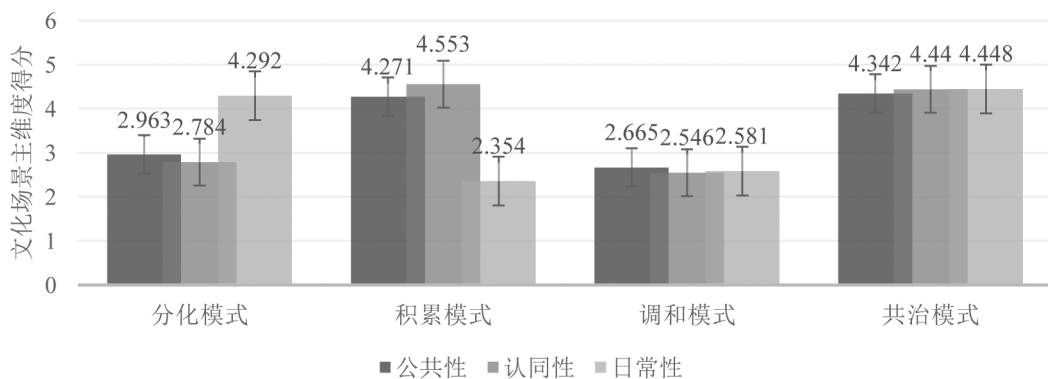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机制4种模式及其分值排布

1. 积累型模式:政策驱动与文化资本悬浮

积累型模式在公共性与认同性相关指标上得分最高,日常性相关指标得分最低。这一模式下,乡村公共设施完备、文化认同较强,但村民日常文化活动参与度偏低。政府主导的文化资源投入强化了历史记忆延续,文化礼堂、祠堂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提升了物理可达性,让公共属性与符号认同表现突出。但资源主要依赖外部输入,村民自主参与度不高,易形成“有场所、无活动”的困境,长期还会造成资源集聚与实践缺失的结构性失衡。

行政主导的空间生产常常忽视农耕节奏与村民主体性,让传统空间从生活场域转变为展示场域。部分古建筑虽经保护性修缮,却因缺乏日常使用沦为静态文化符号。文化符号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公共性与认同性仅停留在形式层面,空间内涵逐渐空心化。统计检验表明,积累型模式在相关时间要素上的均值高于调和型与分化型,可见政策与外部资本对其的推动作用较强,而其符号传播力较弱,相关表征要素得分最低。

2. 分化型模式:现代性冲击下的公共性断裂

分化型模式在日常性维度得分最高,公共性与认同性维度得分较低。这一模式显示,相关村落日常活动较为活跃,但缺乏完善的公共设施支撑,村民参与度和文化认同感均较弱。该模式在时间相关要素上均值最低且方差较小,说明代际

传承功能出现断裂,年轻一代疏离传统文化的同时传统节庆活动逐步减少。市场经济发展与城乡互动加强,让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短期振兴后陷入认同危机,外来资本改造进一步削弱传统空间体系的稳定性,导致空间功能碎片化,最终形成公共文化空间的“悬浮化”。

分化型模式在实践相关要素上得分仅次于积累型,说明现代化活动带来了较高的日常实践频率,但此类实践与公共空间的政治、文化意义相脱节。部分村落将庙会、祠堂改造为旅游表演或商业场所,虽提升了经济活力,却弱化了本土符号的精神内涵。这种表面上的活跃未能转化为村民的深层文化认同,弱关系网络主导下的文化消费,难以让村民形成稳固的归属感。分化型模式呈现出“现代性—公共断裂”的发展特征。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碰撞过程中,时间传承出现断裂,空间实践的自组织机制失效,公共文化空间的凝聚力与认同性被削弱。

3. 调和型模式:符号消费与生态调适

调和型模式在3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处于较低水平。这类村落的文化参与度和认同度偏弱,却常常通过引入新元素进行自我调节。统计分析表明,调和型模式在表征相关要素上均值最高,可见即便公共投入与实践活力不足,其在文化符号呈现方面仍具备一定优势。这一特征多与文旅开发

及外来资本介入相关,部分村落将古民居改造为民宿,突出徽派门楼、天井等标志性符号以吸引游客。这种符号修复提升了场景的可见性,却往往忽视文化生态的整体性,造成形式更新与内涵脱离的矛盾。

调和型模式在时间相关要素上得分处于中等水平,体现出其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但这种协调往往不够全面。在实践相关要素上,这类村落的村民主体性同样较弱,外部资本重构了空间功能,村民仅能从景区运营中获得次级收益,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不高。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碎片化空间治理,让公共空间逐渐演变为服务商业利益的展演场域。调和型模式呈现符号与生态断裂的调整特征,它通过强化符号消费提升吸引力,却导致文化内涵流失,文化生态的可持续性也被短期经济利益取代。量化结果显示,调和型模式虽表征得分较高,却未能将这种优势有效转化为村民的文化认同。

4. 共治型模式:传统传承与多元共治

共治型模式在公共性、认同性与日常性 3 个维度上表现均较为优异,得分高于其他模式类型,体现出传统与现代元素在文化生态层面的有机融合。其深层逻辑体现为代际传承与多元共治的协同发展,时间相关要素方面,代际传承机制保障了历史记忆的积累与仪式活动的延续;实践相关要素方面,紧密的宗族网络通过制度化治理转化为社会资本,推动村民、村委会与外部主体共同参与空间决策;表征相关要素方面,符号系统与价值体系借助祠堂建筑、祭祀仪式等实现深度融合,有效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这种协同发展机制保障了空间生产的高效运行,传统资源得到活化利用,外来因素也被纳入村规民约与公共规则体系,共同推动空间功能的调适与更新。

实证数据印证了共治型模式的均衡性,该模式在时间与实践相关要素上均值最高,说明其具备较强的代际传承能力与社区动员能力。表征相关要素得分略低,但与分化型模式接近,三维机制呈现双高一中的特征,使得共治型模式成为推动

乡村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示范类型。共治型模式通过传统与现代的生态适配,实现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功能的再生产与创新发展。

四、主要研究结论与优化进路

本文以“文化时间—文化实践—文化表征”三维协同机制为分析主线,结合皖南 47 个村落的比较研究,识别出积累型、分化型、调和型、共治型四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模式。研究表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并非单纯的设施建设结果,而是在历史积累、主体互动与符号建构持续作用下形成的动态过程。不同模式的差异,反映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文化传承、治理结构与意义生产方面的不同状态,也揭示出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面临的主要约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优化不能停留于一般性的资源投入与功能完善,而应立足模式差异,围绕日常使用、主体协同、文化认同与分类治理展开系统调整。

(一) 理论回应:三维文化机制视域下的空间生产逻辑

文化时间、文化实践与文化表征共同构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基本机制。文化时间奠定空间演进的历史基础,决定空间的文化延续能力。文化实践明确空间运行的组织方式,影响空间的活化发展程度。文化表征塑造空间的地方内涵,关乎空间能否形成稳定的地方认同与共同体意义。三者在乡村场域中持续交互,共同塑造空间的实际形态。共治型模式的整体表现相对更优,源于其在代际传承、社区动员与符号整合方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积累型、分化型与调和型的发展差异表明,任一维度的发展弱化,都会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整体运行状态产生影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不应仅从单一层面的设施配置或项目开发入手,应将历史文脉延续、治理关系调整与文化意义建构纳入统一框架综合考量。

(二) 实践启示:走向协同共生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优化路径

第一,立足日常生活,提升空间使用效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长效发展,与空间能否融入村

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空间的功能失效往往并非源于场地缺失,而是空间供给与村民日常节律存在偏离,建设逻辑与使用逻辑未能有效衔接。部分空间建成后使用频率较低,核心原因是功能设置脱离村庄的真实需求。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应从村民的日常交往、公共议事、节庆活动、休闲参与与互助实践出发,增强空间的开放性、便利性与常态使用能力。活动安排贴合地方生活节奏,空间功能与村庄内部的公共事务、社会交往建立稳定联系。让公共文化空间成为村民经常进入、愿意停留、能够参与的生活场域,是实现空间可持续发展的运行的重要前提。

第二,强化村民主体地位,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是多元主体持续作用的过程。治理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空间的开放程度、运行稳定性与公共属性。共治型模式的发展优势,源于村民、村庄组织与外部资源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协同关系。积累型、分化型与调和型的发展问题,分别体现出行政主导偏强、市场介入失衡、社区内生力量不足的发展倾向。未来的空间建设需进一步明确村民在公共文化空间中的主体位置。政府承担制度供给、基础保障与公共服务的责任。村庄组织承担协商组织、规则落实与日常协调的责任。市场力量在合理边界内参与空间运营与资源开发。社会组织在资源链接、活动支持与文化服务方面发挥补充作用。建立稳定的议事机制、分工机制与反馈机制,推动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从外部推动转向共同建设,从单一管理转向协同治理。

第三,深化地方文化表达,夯实空间认同基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既是物理场域,也是地方记忆、价值规范与共同体认同的载体。文化表征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空间获得村民认同的程度。共治型模式能够形成较强的社区认同,关键在于祠堂、仪式、节庆等传统符号未停留于静态保存,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持续参与空间的意义生产。分化型与调和型的突出问题,在于空间景观和活动形式较为活跃,文化内涵却易趋于浅表,

导致空间出现景观化和消费化的倾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应将地方历史、村落记忆、礼俗传统与公共伦理融入空间设计、制度安排与活动组织。让文化符号与日常实践保持契合,让空间意义在反复使用中不断累积。使村民能在空间中识别熟悉的地方文化,在实践中不断强化这种文化认同,是公共文化空间获得稳定精神支撑的重要基础。

第四,面向模式差异,推进分类优化发展。不同生产模式对应的问题结构存在差异,优化路径需结合各自特征实施分类调整。针对积累型模式,优化重点放在激活空间使用与增强社会参与上。此类空间已有一定历史积累和物质基础,可通过增加常态化活动、改善开放机制、提升使用便利度,推动空间从保存型运行转向活化型运行。针对分化型模式,优化重点放在修复空间公共性与增强文化认同性上。此类空间的日常活跃度较高,传统文脉的延续性较弱,易受商业逻辑牵引,需加强传统节庆、公共仪式和地方叙事的重新组织,避免公共文化空间被单一消费逻辑占据。针对调和型模式,优化重点放在增强社区主导能力上。此类空间已形成一定的发展平衡,但对外部资源仍有较强依赖,需进一步提升村民在空间使用、活动组织和规则形成中的实际参与程度,增强地方社会对空间的解释权与支配力。针对共治型模式,优化重点放在巩固制度优势与维持生态平衡上。此类空间的整体运行状况较好,需继续保持传统活态传承与多元协商机制之间的良性关系,避免外部资源的快速进入打破已有发展秩序。分类施策的核心,是依据不同模式的结构短板,制定适配的治理方案。

第五,注重传承转化,维持空间发展的长期稳定。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需妥善处理传统延续与现代转化的关系。空间发展的失序状态,常出现在两种发展倾向中。一种是过度注重静态保护,导致空间难以融入当代村民生活。另一种是过度追求功能更新和消费开发,导致文化脉络中断与地方意义流失。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优化发

展,应在延续历史文脉的基础上推动适应性转化,让传统资源在现实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空间改造、活动组织和制度设计均需尊重地方社会的时间节律与文化逻辑,让传统贴合现实,让更新扎根根脉。在持续传承中实现有效转化,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能力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 [1]刘思达. 社会空间:从齐美尔到戈夫曼[J]. 社会学研究,2023,38(4):142-159,229.
- [2]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4.
- [3]唐正东. 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一种批判性的解读[J]. 南京社会科学,2016(1):39-46,92.
- [4]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 [M]. Paris:Edward Arnold, 1977:461.
- [5]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8.
- [6]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63.
- [7]奥斯本. 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M]. 王志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
- [8]李春敏. 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54.
- [9]刘怀玉. 《空间的生产》的空间历史唯物主义观[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68(1):61-69.
- [10]路璐,朱志平. 历史、景观与主体: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文化空间建构[J]. 南京社会科学,2018(11):115-122.
- [11]刘璐. 现代视阈中乡村文化空间的危机与再生产[J]. 民族艺术研究,2020,33(2):102-110.
- [12]张培奇,胡惠林. 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空间转向[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0):99-104.
- [13]宁晶,陈华文. 外推与内生: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再生产的动力机制[J]. 文化遗产,2021(5):126-132.
- [14]方菲,李旺. 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良性再生产:以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4):88-94,184.
- [15]吕龙,黄震方,陈晓艳. 文化记忆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进展及框架构建[J]. 人文地理,2018,33(2):35-42.
- [16]ZHANG J, ZHENG Y, XIANG Y.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pace and power relationship in Dananpo villag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6, 122: 103902.
- [17]YI X, FU X, LIN B, et al. Authenticity, identity, self-improvement, and responsibility at heritage sites: the local residents' perspective[J]. Tourism management, 2024, 102: 104875.
- [18]AQUILINO L, HARRIS J, WISE N. A sense of rurality: events, placemaking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a small Welsh tow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3: 138-145.
- [19]何建华. 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J]. 伦理学研究, 2018(4):93-97.
- [20]胡惠林. 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从传统乡村走向现代中国乡村:三论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50-66.
- [21]孙绍勇,周伟.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54(5):104-113.
- [22]孙刚,罗昊.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与政策路径[J]. 江汉论坛,2021(7):85-90.
- [23]朱冬亮,朱婷婷. 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路径探析:以社区能力建设为视角[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29-137.
- [24]徐勇. 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东南学术,2018(5):132-137.
- [25]西尔,克拉克. 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M]. 祁述裕,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
- [26]陈波. 我们为什么“必须”和“应该”:架通从“是”到“应该”的桥梁[J]. 中国社会科学,2024(11):47-65,205.
- [27]温忠麟,谢晋艳,王惠惠. 潜在类别模型的原理、步骤及程序[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1):1-15.